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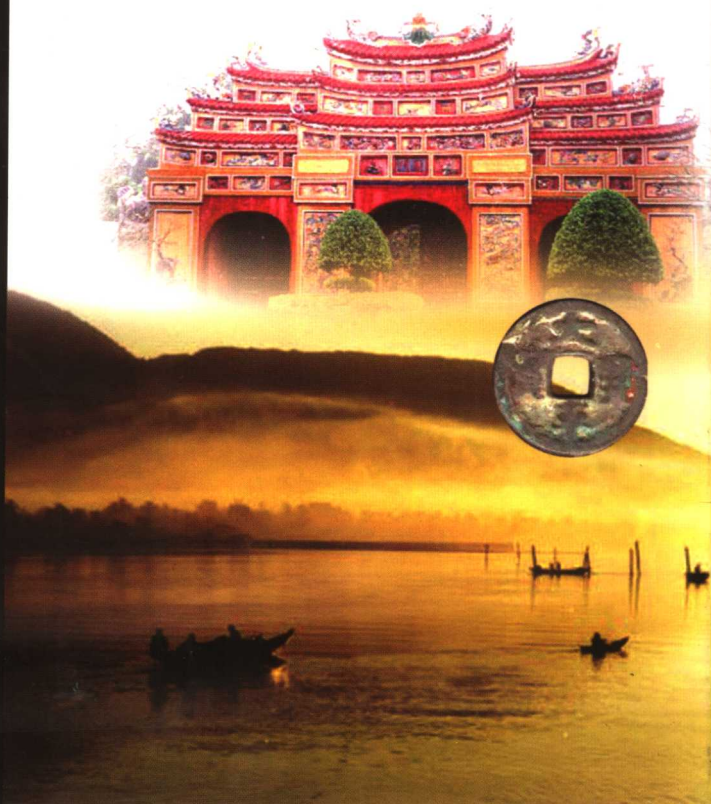


《边疆史地》丛书

QINGDAI
ZHONGYUE
ZONGFANGUANXI
YANJIU

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

孙宏年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孙宏年著.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316-4358-8

I. 清... II. 孙... III. 中越关系—国家关系史—研究—清代 IV. D829.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5988 号

《边疆史地》丛书

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

QINGDAI ZHONGYUE ZONGFAN GUANXI YANJIU

孙宏年 著

责任编辑:刘剑刚

技术编辑:傅 辉 王秀艳

封面设计:陈冬妮 傅 旭

责任校对:耿 熹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4·字数 3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16-4358-8/K·118 定价:56.00 元



作者简介

孙宏年，男，1972年2月生，山东省兖州人。200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历史地理、中外关系研究，侧重于中越关系、西南边疆史地研究。

编委会

马大正

王晓明

厉声

李国强

李大龙

封面设计
责任编辑

陈冬妮
刘剑刚

傅旭

ISBN 7-5316-4358-8

K · 118 定价:56.00元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

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12月

序 一

葛剑雄

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藩属国关系的演变、与此相关的疆域变迁,是历史政治地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组成部分。但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者往往视为畏途,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尚无改观。固然,这方面的研究前人已做过不少,因而不易取得新的成绩,但更重要的还是政治上障碍——一涉及现实需要,历史事实也会变得非常敏感。有时学者辛辛苦苦完成的论著,得出的结论,却因不合时宜而被束之高阁,或者只能作为内部流通,无法为学术界与社会所利用。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大多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有的则因某种权威说法公布于前,尽管未必正确,却再也无法改变。对国内学者或外国政府的错误说法,也难以作出及时和有效的批驳。这种状况不改变,学术自然无法繁荣,但国家利益受到的损失更大。没有实事求是的研究,不首先查清史实,不了解中国与邻国关系和边界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如何能制订出正确的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睦邻关系?

以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为例。某一种影响颇大的《中国通史》

认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应以今国界为限。这样一来,越南当然不能包括在宋代以前的中国疆域之内,此前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也成了“国际关系”。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东汉初设置在今越南北方的交趾郡就成了外国,伏波将军马援出兵前往平定二征姐妹的反抗就成了对邻国的侵略,认为应该表示“歉意”。实际上,不仅交趾郡,就是更南的九真和日南二郡(至今越南中南部)当时也是汉朝的疆域,马援出兵充其量只是统治者镇压民间的“起义”或“叛乱”。直到公元10世纪越南脱离中原王朝自立,并成为中国历代的属国,两国间才建成一种宗藩关系——既不同于中国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有异于现代独立国家间的关系。但由于过于突出“政治需要”,片面强调“古为今用”,在中越关系处于“同志加兄弟”时,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讨论两国学者间的分歧,尽管在某些方面一直很尖锐。而当两国交恶时,似乎以往两千多年间只有冲突和战争。

正因为如此,当孙宏年提出以中越关系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时,我着实为他担心,深恐难以把握,或者完成后无法发表。但随着他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放心,因为他搜集的史料相当全面细致,对已发表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也了如指掌,论证的过程都以事实为根据,得出的结论具有说服力。以往我对中越关系和中越边界并未作过专门研究,但在随侍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时,多次聆听先师在审定《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所作教诲,得知先师十分重视戴可来先生对中越关系和中越边界方面的见解,并有幸见过戴先生。因此我让宏年去郑州大学向戴先生求教,并请戴先生评审宏年的博士论文,得到了他的好评,在答辩时也顺利通过。

毕业后,宏年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

作,研究之余,继续修订和完善博士论文,终于形成《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这本专著。在本书问世之前,宏年要我写几句话,因此我作了上述说明。

近年来,中越两国领导人已经形成“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共识。历史学者的任务虽然是“记录过去”,但同样是为了开辟未来。因为只有了解过去的事实,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开辟未来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方向。因此,对中越关系过去的研究不会因为现实的变化而失去意义。

2005年3月27日

序 二

戴可来

越南古为交趾之地,中越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古籍中有关羲叔“宅南交”,神农、颛顼、尧、舜等南至交趾或南抚交趾的记载,反映了早咱传说时代,中国中原地区已与南方的交趾有了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和交往。而越南的信史不能早于秦代,约有两千余年,其中隶属中国郡县千余年,称“北属时期”或“郡县时代”。越南在宋初(968年)摆脱了中国封建王朝长达千年的郡县统治,建立自主封建国家,但立国之后,仍与宋朝以降历代封建王朝建立了以朝贡和册封为核心内容的宗藩关系,形成了两国邦交的基本模式。直到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这种关系和模式才告终止。

清代中越关系是这种模式的最后阶段,也是内涵最为丰富的阶段,这又是中越关系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由于这一时期双方政治变动频繁,涉及的问题复杂,给研究带来不少困难。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有不少论著问世,但又主要集中在一些问题,比如乾隆时期的安南之役、中法战争时期的中越关系等等,因此从总体上

看又略显粗疏,仍需要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孙宏年同志的这部专著堪称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提高而成的。通读全书,可以发现此书的特点之一是史料丰富,充分利用了中越两国的官修史书、政书、档案、志书、奏议、文集等文献资料,还利用了一些已经翻译出版的法国档案。作者查阅资料时十分勤奋,力求详尽。1999年春,当他还在读博士时,就曾到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进行交流、学习,越南所和我本人为他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越南史料,其中包括《大南实录》、《大南会典事例》、《历朝宪章类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这些都是研究清代中越关系的重要的越南文献,作者在这部专著中给予了充分重视,并结合中国史料,使一些问题的论证更有说服力。

此书的特点之二是对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内容、事项、规范、经贸关系、边界、海事和边事以及华侨、华人问题作了系统地阐述和考辨,构建了这一时期中越关系研究的框架体系,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这主要反映在对清代中越宗藩往来的事项、规范和海难互助、边境事件、华侨华人数量以及来华越南侨民等方面,比如对于清代的中越侨民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比较关注在越南的华侨、华人问题,而对于进入中国的越南侨民,特别是政治避难者关注不够,且对进入越南的华侨、华人的数量问题也较少研究,本书中都力求详尽地论述。这些研究仅仅是一家之言,或许有其不成熟之处,但又把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此书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非尽善尽美,而是仍有需要进一步提高之处,比如,中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涉及方面较多,而且影响深远,又是清代中越关系的重要内容,本书对此却缺乏

完整的理论阐发；又如作者未学习过越南语，只能参考已经翻译出来的越南文的论著，不能便利地直接阅读，在法文档案、论著方面也是如此。这也对一名年轻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继续努力，特别是学习越南、法国等国的语言文字，把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中越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老一代学者对于年轻同志所寄予的厚望！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承作者雅嘱，为本书作序，欣然命笔，勉缀数语，以表达对他的祝贺和鼓励。

2005年3月于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

前 言

中、越关系源远流长。自秦汉至宋初,今天越南的北部、中部地区长期为中国封建王朝统辖下的郡县,这一时期即为越南历史上的“北属时期”。968年,丁部领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大瞿越”,越南从此摆脱了中国的封建统治,而两国统治者之间的宗藩往来也由此开始。^①此后,除1406年—1428年间一度为明朝统治外,两国的宗藩关系维持了近千年,直到1885年越南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

本书以1644年—1885年间的中越宗藩关系为研究对象。有的学者把中越宗藩关系称为“传统的官方关系”或“传统的朝贡关系”,也有学者把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归结为“天朝礼治体系”,并对中国与琉球、朝鲜等国的宗藩关系作了较

① 对于越南的立国时间,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始于雄王时代建立的文郎国,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越南、法国、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此说;二是始于938年(后晋天福三年)吴权建国;三是始于968年(宋开宝三年)丁部领建国;四是始于1174年(宋淳熙元年)南宋王朝册封李天祚为安南国王。后三种观点在中国学者中各有支持者,参见楚汉《五代宋初越南历史三题》,《东南亚纵横》1992年第4期;孔嘉《越南立国始于何时》,《东南亚纵横》1993年第3期。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为全面的研究。^①笔者认为,1644年—1885年间的中越关系是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内容不仅包括宗藩关系,而且还涉及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交流、边界领土交涉和海事、边事以及侨民等诸多方面;宗藩关系是两国相互认可的封建王朝或政权之间的官方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边界交涉等方面一样,都是当时两国关系的一部分,因为清代中国与并不存在宗藩关系的国家也有经贸、文化往来乃至侨民、边界交涉;宗藩关系又与其他方面相互影响,其演变、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中越关系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中外学者已对1644年—1885年间的中越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中国学者的专题性论著主要集中于宗藩关系、边界问题和华侨问题。对于宗藩关系,《清实录》、《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等典籍都记述了某些史实,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出版的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东南亚史方面的著作也往往简要论及,又大多提到1788年—1789年清朝出兵安南和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相关论文也大多集中在这两个点上。边界问题的研究大多与1885年后的中法勘定中越边界有关,华侨问题的研究又多与政治、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相关。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学者编辑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邵循正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及其续编《中法战争》(张振鹄主编,中华书局1995年—1999年版)、《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

^① 余定邦、喻常森等著:《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黄枝连著:《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版社 1982 年版)、《中法越南交涉档》(郭廷以、王聿均主编,台北 1988 年版)、《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黄国安、萧德浩、杨立冰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萧德浩、黄铮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等资料集,出版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陈修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 年版)、《中越关系史简编》(黄国安、杨万秀、杨立冰、黄铮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余定邦、喻常森等著,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专著,使中越关系的综合研究提高到全新的水平,但对有些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陈荆和、吕士朋为代表的港台地区学者,不仅整理了大量的资料,而且对宗藩关系、边界、华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越南学者的研究,以陈重金所著《越南通史》、明崢所著的《越南史略》(初稿)和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第一集)为代表。它们在论述本国通史时都涉及到了 1644 年—1885 年间的中越宗藩关系、经贸往来、华侨等问题,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他们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别,如《越南通史》谈及宗藩关系时只把它视为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认为该国向中国朝贡是“取小国必须尊敬大国之义”,“并无多少损失,国家仍保持独立”^①;《越南历史》则认为越南阮朝与清朝维持宗藩关系“表现出它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始终保持盲目隶属的臣服态度”。^②

中、越两国之外,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多,山本达郎主编

① 戴可来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386 页。

② 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58 页。

的《越南中国关系史——从曲氏抬头到清法战争》(东京山川出版社 1975 年版)又是其中的代表作,尤其值得注意。该书论述了从唐末曲氏割据交州到 1885 年间的中越关系,第六至九章对 1644 年—1885 年间的宗藩关系、经贸关系、文化交流、边界领土、边事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是当时中越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此书为众多学者合作而成,详略侧重各有不同,其中有些方面有欠系统,有些论点有待商榷。如该书第九章(第 552~558 页)列出了 1789 年—1850 年间朝鲜、琉球、越南、暹罗的朝贡次数,试图通过比较来说明这一阶段清朝与阮朝的朝贡关系实际上已极为疏远,这意味着阮朝对清朝的独立态度在增强,“阮朝与清朝的关系,名为朝贡关系,实为对等关系”。其实,著者是带着“朝贡关系即依附关系”的观点寻找论据的,又未充分利用有关史料,统计中有所遗漏,而且未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所得结论值得商榷。

本书在总结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中越两国的官修史书、政书、档案、志书、奏议、文集等史料为依据,对清代中越宗藩关系和宗藩关系前提下的其他关系进行研究、探讨。^①全书共分八章,各章论述的主要问题是:

一、1644 年—1885 年间,两国都发生过多国内战争,19 世纪起又都遭到列强的侵略,处于千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之中。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之下,中越宗藩关系是如何发展变化的?第一章论述这一演进过程,并以此作为其他方面研究的背景。

二、对于清代中越宗藩关系,有些学者在宏观论述中涉及相

① 中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涉及方面较多,而且影响深远,对于清代两国的宗藩关系也有一定影响,因笔者学力有限,本书中暂不作为专门一章论述,以后再作进一步探讨。

关问题,^①有些学者对此作过具体分析,还有的在清代中越关系的相关研究中涉及这一问题。^②这些研究见仁见智,但对宗藩关系的实际运作情况鲜有论述。第二章拟对此进行研究,即宗藩关系涉及哪些内容、事项,包括哪些礼仪、规范。

三、朝贡贸易是伴随着宗藩往来进行的官方经贸活动,与宗藩关系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中国学者李金明、廖大珂合著《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多种论著都论及朝贡贸易问题,中越关系方面的论著往往涉及朝贡贸易,但研究仍较为薄弱。清代中越两国的朝贡贸易包括几

-
- ① 著作如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吕士朋《北属时期的安南》等等。论文如张效乾《明清两代与越南》,《大陆杂志》第35卷第3期;龙永行《近代中越宗藩关系刍议》,《东南亚研究》1987年第1、2期;陈双燕《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院专刊,1994年8月15日版;陈双燕《试论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的文化心理基础》,《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2期;黄清根、陆妙春《中越宗藩关系简论》,《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 ② 专著如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张雁深《中法外交关系史考》,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论文如吕士朋《清代康熙乾隆三朝之中越关系》(上)、《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分别载《东海学报》第14、16卷;庄吉发《清高宗册封安南国王阮光平始末》,《越南国王阮福映遣使人贡清廷考》,分别载《故宫文献》2卷3、4期,《大陆杂志》54卷2期;萧德浩《中法战争时期的中越关系》,《广西社会科学》1985创刊号;李延凌《乾隆与清代中越战争》,《印度支那》1989年第2期;喻常森《越南西山起义期间的中越关系》,《东南亚学刊》第10期;陈双燕《试论近代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孙宏年《应山为清前期安南贡道必经之地》和《清代越南政治避难者问题初探(1644年—1885年)》、《清代中越海难互助及其影响略论(1644年—1885年)》,分别载《历史地理》第16辑和《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2001年第2期;牛军凯《南明与安南关系初探》,《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日]铃木中正《乾隆安南远征考》,《东洋学报》50卷2、3期;[日]和田博德《越南辑略——中国人的东南亚知识和清法战争》,《史学》44卷4期。